

# “三农”决策要参

2015 年第 37 期（总第 123 期）

清华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5 年 12 月 10 日

## 生态服务、精准扶贫与生态就业 ——生态补偿项目如何一石二鸟？<sup>\*</sup>

**内容摘要：**有研究表明，生态补偿可能具有提供生态服务和减缓贫困的潜力。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方式多种多样，其中，生态就业项目是一种由政府提供劳动机会的生态补偿形式。本文利用北京市延庆县 448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研究生态就业项目双向选择过程的影响因素，并且借助洛伦兹曲线提出了完善生态就业项目的切入点。研究表明，延庆县的生态就业项目主要考虑生态服务价值因素，而没有或较少考虑贫困因素；由于瞄准机制存在偏差，一些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也参与到生态就业项目中，所以延庆县的生态就业项目的成本费用高于其最优水平；由于农户在机会成本和贫困程度方面具有较大的异质性，所以加大这两方面的基础数据收集会更多地提高生态补偿资金的成本效益。

**关键词：**生态就业 精准扶贫 生态服务 生态补偿

<sup>\*</sup>本文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5 清华农村研究博士生论坛”入围论文。

## 一、引言

近年来，生态补偿越来越受到关注，不仅是因为它具有较好的提供生态服务的潜力，而且一些研究表明生态补偿可能成为一种减缓贫困的方式，原因是生态补偿项目通常对农村的自然资源管理者进行一笔费用支付，如果生态补偿费用能够准确地支付给穷人，并且穷人能够提供更多的生态服务，那么生态补偿项目就可能实现提供生态服务和减缓贫困的双赢。生态就业项目是一种由政府购买生态服务的生态补偿形式，是一种“有条件”的补贴，也是政府利用财政手段进行的一种转移支付。接受补贴的对象需要参与生态就业项目并提供生态服务。参与生态就业项目的人员会承担机会成本，机会成本高于生态就业项目补偿金的人员就不愿意参与到生态就业项目中，而机会成本较高的人员往往能够通过其他劳动形式获得较高的收入。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开发中存在针对性不强的问题，精准扶贫在现实中的“脱靶”现象非常突出，而生态就业项目可能进一步成为一种精准扶贫的手段。设计良好的生态就业项目，在为区域提供生态服务、缓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和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目前关于生态补偿在减缓贫困方面的研究较多，各方的研究结果均表明，设计良好的生态补偿项目具有缓解贫困的作用，但是关于生态补偿在精准扶贫方面的研究很少。由于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方式多种多样，所以生态补偿在减贫方面的作用还需要针对不同的生态补偿项目类型进行具体分析。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如

何提高生态就业项目的补偿资金的成本效益，达到提供生态服务和精准扶贫的双赢。本文首先以文献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利用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多样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以揭示现象。然后根据描述性统计揭示的现象，将生态服务价值因素和贫困因素量化进入二元 Logit 模型，判断目前的生态就业项目是否同时考虑了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借助洛伦兹曲线提出了完善生态就业项目的切入点。最后本文根据实证分析结果，针对生态就业项目如何实现生态目标和减贫目标，如何提高生态就业项目资金的成本效益，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 二、理论框架

外部性、生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不完善的产权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形式的市场失灵，会造成资源的消耗大于社会最优的消耗量。所以，一种观点认为生态补偿是科斯定理的应用，是一种在产权明确界定和交易费用很低的情况下，通过讨价还价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方法；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生态补偿是一种生态服务使用者向生态服务提供者有条件的转移支付。本文所讲的生态就业项目与第二种观点相近。

在实践中，生态补偿项目在项目类型、生态服务规模、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金额、评价标准等方面各不相同。根据付费主体的不同，生态补偿项目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态服务的使用者作为生态服务的购买者，一类是政府或其他组织代替生态服务的使用者购买生态服务。使用者付费的生态补偿项目是

最接近科斯定理的情形，其有效性高于以政府为资金来源的生态补偿项目；但是以政府为资金来源的生态补偿项目可能具有规模效应和较低的交易成本。如果生态服务是私人物品或者俱乐部物品，通常容易识别出受益者并要求其付费，然而当生态服务是纯公共物品时，由于受益者数量很多，搭便车的成本就很低，此时政府作为生态补偿的购买者就成了唯一的选择。生态就业项目就是一种由政府购买生态服务的生态补偿形式。

因为生态补偿项目的生态目标和减贫目标并不是自动达成统一的，所以明确地提出减贫目标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提高补偿资金的成本效益，进而增强其可持续性。Gauvin 等人首先对具有双重目标的生态补偿项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比了几种不同路径的成本效益，认为按照“黄金标准”实施生态补偿项目，项目的收益会大量增加：如果政府能够识别出贫困户，并且使其提供更多的生态服务，那么可能会产生生态效益和减缓贫困双赢的效果，比如瞄准一些由贫困户实施的具有高生态服务价值和低机会成本的项目。生态就业项目的参与者都是贫困户，并且与没有参与的人员相比能提供更多的生态服务，这是最理想的实现生态效益和减缓贫困双赢的情况。如果生态效益和减缓贫困之间不存在权衡，那么在项目实施初期按照生态效益最大化选择的农户也将是扶贫工作要瞄准的对象。如果生态效益和减缓贫困之间具有完全的替代性，生态补偿的两个目标就是统一的，实现一个目标的效益最大化以后，就会自动实现另外一个目标的效益最大化。但

是很显然，现实中这种理想的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生态补偿的两个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权衡。两个目标的总和的最大化可以理解为一种帕累托最优：如果生态效益和缓解贫困之间具有不完全的替代性，那么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项目实施者不可能不损失任何生态效益而获得更大减贫效果，也不可能通过牺牲任何减贫效果得到更多生态效益。

生态就业具有克服传统扶贫方式弊端的潜力。Darity 等人认为，政府转移支付不仅没能让穷人脱离贫穷，反而使穷人深陷贫困之中，这与转移支付引起的行为反应有关。刘穷志基于中国转移支付救助贫困的制度背景，构建了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模型，运用中国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转移支付保证了贫困家庭的基本生存条件，但转移支付激励减少了贫困家庭的劳动和投资，家庭总收入也相应减少，从而使贫困家庭难以脱贫致富。樊丽明和解歪认为，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可能原因是：①公共转移支付的覆盖面有限且水平较低；②公共转移支付没有与劳动力市场相关联；③公共转移支付减贫的识别、瞄准机制不完善。生态就业作为一种有条件的转移支付方式，具有克服以上三个缺陷的潜力。首先，原则上，生态就业的岗位补贴与生态就业人员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有关，生态服务价值越大，岗位补贴越多。第二，生态就业直接与劳动力市场相关联，提供了劳动岗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贫困脆弱性。第三，生态就业岗位补贴是以参与生态就业项目提供生态服务为

条件的，与一般的转移支付方式不同，这会把一些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自动排除在补贴范围之外，于是就解决了扶贫工作中的一大难题——贫困户的识别和筛选问题。

生态就业能够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激发农民建设美丽乡村的自主性。陈锡文认为，如果农民没有形成环境保护意识，中国环保工作的推进将非常困难，但是无端地指责农民没有环保意识是不公道的，因为在城乡收入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农民需要维持生计。目前延庆县的生态就业项目具有广覆盖性，这不仅提高了生态就业人员的环保意识，而且辐射带动各村环保意识的提高。在问卷调查中，有 85.6% 的受访者认为近 5 年来村里环境有改善，这也是调研人员的感受。此外，生态就业作为一种转移支付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统筹城乡协同发展，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延庆县的生态就业项目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一般来说，影响农户参与生态就业项目的因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农户自身因素，一类是政府实施生态就业项目的相关规定。机会成本是政府和农户都要考虑的因素。因为如果生态就业项目的转移支付收入小于农户的最小机会成本，那么就没有农户参与生态就业项目；如果生态就业项目的转移支付收入大于农户的最大机会成本，那么就会造成生态就业项目资金的浪费，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农户的机会成本就是生态就业项目的费用成本。生态服务价值是政府购买生态服务的量化体现，是生态补偿支付不断进行的基

础。农户的贫困状态是生态就业项目实现生态目标和减贫目标的关键影响因素，因为根据生态就业项目实施方式的不同，贫困状态对农户参与生态就业项目的影响，既可能是促进作用，也可能是阻碍作用，还可能没有显著作用。项目实施者的个人意志也会影响生态就业项目的实施，比如邢祖礼以四川省内江市退耕还林为例，揭示了寻租者（村镇干部）只注重退耕还林项目而不注重其生产性绩效的寻租逻辑。

###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本文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延庆县的生态就业项目为例进行研究。延庆县作为研究地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011年延庆县的有形生态资产约为1524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约为82亿元。立足于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延庆县农民不能发展对环境不友好的生计，工业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就业渠道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是该县就业情况的突出特点。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的农民收入中，转移性收入主要来自离退休金、养老金和生态补偿金等，其中，生态补偿金是受政策影响最大的一部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生态就业项目在微观上波动性较大，其补偿收入还不是农户的一项长期生计来源。延庆县的生态就业项目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养山就业、保洁就业、养路就业和管水就业。截至2014年，全县有近3万人实现了绿色生态就业，农村

劳动力生态就业项目率<sup>①</sup>达到近 30%。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4 年对延庆县进行的两次入户调查。在北部山区、川区、东部山区、南部山区随机选取了 8 个乡镇，分别是旧县镇、康庄镇、四海镇、沈家营镇、刘斌堡乡、千家店镇、大庄科乡、井庄镇。在每个乡镇随机进行问卷调查。考虑到大部分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较低，问卷由调研员根据调研对象的回答代为填写。问卷包括家庭成员信息：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职业和外出务工时间等；自然资本情况：耕地亩数、耕地质量、林地亩数和林地质量等；物化资本情况：住宅间数、住宅类型、住宅建造年份和主要耐用消费品<sup>②</sup>或生产性固定资产<sup>③</sup>等；家庭收入情况：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家庭支出情况：食品支出、生活支出、教育抚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生产性支出和人情交往支出等；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类型：退耕还林、平原造林、退稻还旱或还林，是否从事水管员、公路养护员、护林员和保洁员等；还包括地形、近 5 年当地环境变化和对生态补偿的主观评价等内容。共发放问卷 482 份，剔除有数据缺失的样本，得到有效问卷 448 份。样本中，参与生态就业项目的农户有 181 户，没有参与生态就业项目

---

①劳动力生态就业项目率=从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劳动力人数/劳动力总数×100%。

②家庭主要消费品包括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抽油烟机、自行车、摩托车、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电视机、照相机和计算机。

③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包括汽车、拖拉机、脱粒机、收割机、农用动力机械、水泵。



的农户有 267 户。

本文的变量选择主要围绕三个方面。

### （1）生态就业项目的环境价值

即生态就业项目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Gauvin 等人使用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的二手数据和问卷调查的一手数据形成的复合数据作为生态服务价值的指标。Uchida 等人则使用地块的坡度信息作为生态服务价值的指标。本文参考 Uchida 的做法。在一个多地形的地区，往往山区的生态价值高于平原地区，山区的生态环境改善往往能较大程度地提高生态安全和水资源涵养水平。在延庆县，地形基本能够代表某一地区能够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的水平。依据生态就业项目人员所在地区的不同，本文使用地形这一类别变量衡量生态服务价值的大小。但是使用地形衡量生态服务价值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一些潜在的生态服务不能够完全通过地形衡量，一些绿化程度高、水源质量好的平原地区也能够提供较多的生态服务。而且仅仅以地形作为生态服务价值的指标，忽略了每个生态就业项目参与者之间的异质性。但是由于第一手数据的限制，本文仅仅使用了地形作为生态服务价值的衡量指标，这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 （2）生态就业项目参与者的机会成本

本文用外出务工时间作为农户参与生态就业项目的机会成本，原因是在调研中发现，在不能从事生态就业项目的的时间里，农户往往选择外出务工或者在本地务工、务农。而且外出务工的

收益一般大于本地务农或务工的收入，所以本文使用一年中在外打工的月数作为生态就业项目人员机会成本的衡量指标。这个指标的选取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外出务工时间是对机会成本在时间上的一种量化，不是务工收入的量化。但是在调研中直接获取外出务工收入信息容易引起调查对象的警惕心，进而造成其对外出务工收入的夸大或隐瞒，甚至造成其他问卷信息的测量误差。外出务工时间在数据准确性上优于外出务工收入，所以本文选择外出务工时间作为机会成本的衡量指标。

### （3）家庭的贫困程度

我们在问卷调查中经常发现，有的村民为了面子夸大自己的收入水平，或者为了得到补贴而隐瞒自己的收入信息，而且有一些不合法的收入信息是不可能观测到的。Gauvin 等人利用家庭总资产数据产生了每个家庭的财富指标。参考 Gauvin 的做法，本文没有使用收入作为衡量家庭贫困程度的指标，而是使用家庭总资产：根据住宅间数和年内是否购买过主要耐用消费品或生产性固定资产衡量农户的贫困程度。下文中，主要耐用消费品和生产性固定资产统称为大宗物品。与使用收入作为贫困指标有所不同，使用家庭总资产作为贫困指标具有较少的测量误差。要准确地度量农户的财富水平并不容易，但中国农民对于大房子有非常强烈的偏好，拥有宽敞明亮的住房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尤其如此。此外，为了谨慎地估计贫困是否是生态就业项目的影响因素，本文使用了住宅间数和是否购买大宗物品两个变

量。如果两个变量均显著，则认为贫困是影响农户参与生态就业项目的因素；如果两个变量均不显著，则认为目前的贫困因素不能影响农户参与生态就业项目。如果这两个变量只有一个显著，则本文谨慎地认为，不能判断生态就业项目是否考虑了贫困因素，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户是否参与生态就业项目。由于是以家庭为研究对象，所以本文模型还包括家庭耕地亩数和家庭人口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本文没有考虑参与户对未参与户的溢出效应而引起的估计偏差，例如参与生态就业项目的农户在农忙时会找没有参与的邻居或亲戚代为上岗（尽管很多村干部表示这种代岗是不允许的），这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本文以家庭为研究对象，因为在中国经济史上，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一直都是农户家庭而不是个体化的雇工。在一定程度上，今天依然如此，家庭的利益和需求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是不能被忽略的因素。

#### 四、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参与生态就业项目的农户和未参与生态就业项目的农户的差异检验见表 1。从表中可以看出地形、住宅间数、年龄、教育年限、家庭人口规模和家庭支出等变量的均值在参与户和未参与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参与户的地形均值约为 2.2，未参与户的地形均值约为 1.8，并且前者显著大于后者。参与户的住宅间数均值约为 5.2，未参与户的住宅间数均值约为 4.6，并且前者显著大于后者。购买大宗物品和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月数，在参与户和未参与

户之间均没有显著差异。从差异性检验的结果可以大致推断，政府和农户在生态就业项目的双向选择过程中，生态服务价值是影响生态就业项目参与的因素；贫困程度似乎也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但是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瞄准出现了偏差，即参与者的财富水平高于未参与者的财富水平。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机会成本似乎不是影响生态就业项目参与的因素。

表 1 参与户和未参与户的差异性检验

Variables	变量定义	G0	Mean0	G1	Mean1	MeanDiff
terrain	地形	267	1.805	181	2.21	-0.405***
house	住宅间数	267	4.639	181	5.152	-0.513**
commodity	年内是否购买大宗物品	267	0.393	181	0.464	-0.071
mworktime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总月数	267	1.274	181	1.747	-0.473
land_farm	耕地亩数	267	3.038	181	3.675	-0.637
age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267	51.635	181	44.139	7.496***
edu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267	5.273	181	5.965	-0.692*
gen	家庭性别结构	267	0.505	181	0.524	-0.018
hhsiz	家庭人口规模	267	2.678	181	3.265	-0.587***
expen	家庭支出（元）	267	2.80E+04	181	3.30E+04	-4.8e+03***
inc_net	家庭净收入（元）	267	8455.36	181	8981.481	-526.121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注：G0 是未参与户的变量观测值个数，Mean0 是未参与户的变量平均值。同理 G1 和 Mean1 是参与户的变量观测值个数和平均值。Meandiff 是平均值的差。terrain 的取值为 1、2、3，分别代表山区、半山区和平原地区。家庭性别结构中，0 代表女性，1 代表男性。农户习惯于使用“间”作为住宅面积的度量单位，一般一间房前后长 5 米左右，宽 3~3.5 米，面积约为 15~20 平方米。

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参与户和未参与户在生态服务价值、贫困程度和机会成本方面的差异情况，本文构造了散点图（见图 1）。从散点图可以直观地看出，项目选择了一些生态服务价值低、机会成本高的富裕户参与到生态就业项目中，同时一些生态服务价值高、机会成本低的贫困户却没能参与到生态就业项目中。可见，

目前的生态就业项目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其在实现生态目标和减贫目标的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具有较高生态效益的参与者不一定是贫困户，富裕户也可能由于隐瞒其财富状况而参与到生态就业项目中，这个问题影响了生态就业项目减贫目标的实现；二是参与生态就业项目的农户提供的生态服务的价值不一定是最大的，这个问题影响了生态就业项目生态目标的实现。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提高对农户的识别和筛选的准确性可以作为完善生态就业项目的一个切入点，即吸引机会成本低、生态服务价值高的贫困户参与生态就业项目。如果不能准确地识别出贫困户并且使其参与到生态就业项目中，那么生态就业项目的减贫目标将很难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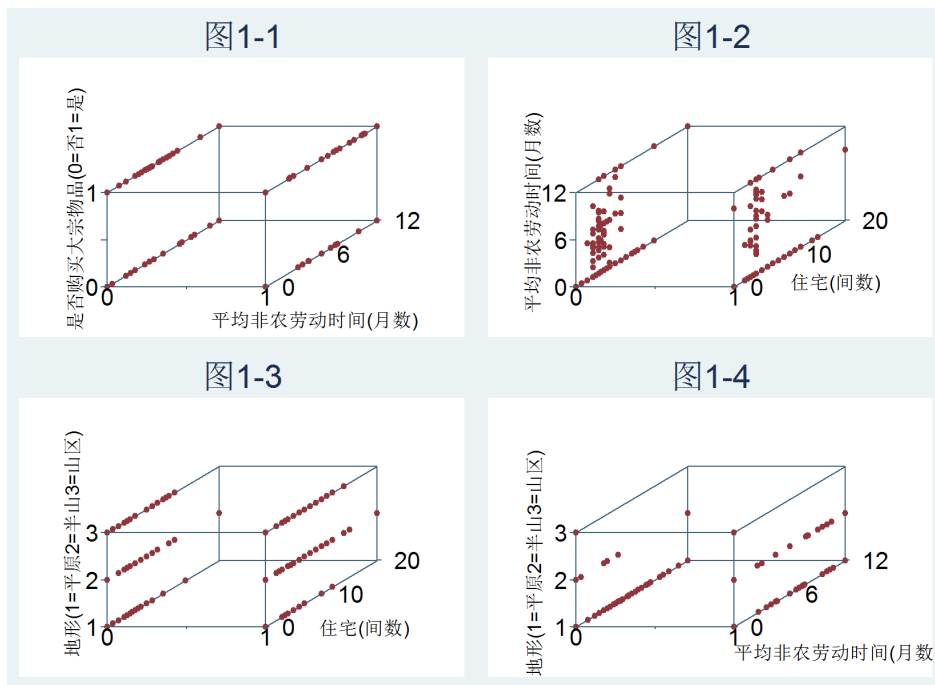


图 1 参与户和未参与户的分布图

## 五、实证分析结果

### 1. 二元 Logit 模型分析

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对以上变量进行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2。模型（1）仅包括以地形衡量的生态服务价值因素，模型（2）增加了以外出务工月数衡量的机会成本因素，模型（3）增加了以住宅间数和年内是否购买大宗物品衡量的贫困程度因素，模型（4）包括前三个模型的所有影响因素以及耕地亩数和家庭人口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各个变量系数的回归结果是比较稳定的，说明本模型的稳健性比较好。随着解释变量的不断增加，模型的解释力稳步地由 0.045 上升到 0.142。地形的回归结果在所有模型中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其系数一直显著为正，说明生态服务价值越大的地区，农户越容易参与生态就业项目。模型（2）、（3）、（4）中，外出务工月数的回归结果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机会成本越高的农户越容易参与到生态就业项目中，这会导致目前的生态就业项目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模型（3）、（4）中，住宅间数和是否购买大宗物品的系数均不显著，所以就目前的证据来说，仍不能说明贫困是影响农户参与生态就业的因素。二元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延庆县目前的生态就业项目考虑了生态服务价值因素，但是没有考虑贫困程度因素。由于项目倾向于使得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参与进来，而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期望得到的生态就业转移支付也较高，这会造成生态就业项目的费用成本高于其最优水平。

表2 二元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2)	(3)	(4)
terrain	0.637 <sup>***</sup> (5.10)	0.874 <sup>***</sup> (6.12)	0.882 <sup>***</sup> (6.03)	1.082 <sup>***</sup> (6.54)
mworktime		0.140 <sup>***</sup> (3.94)	0.130 <sup>***</sup> (3.55)	0.143 <sup>***</sup> (3.71)
house			0.0225(0.57)	-0.0294(-0.71)
commodity			0.337(1.60)	0.258(1.17)
land_farm				0.0516 <sup>*</sup> (2.02)
hhszise				0.569 <sup>***</sup> (5.51)
cons	-1.668 <sup>***</sup> (-6.09)	-2.360 <sup>***</sup> (-6.97)	-2.614 <sup>***</sup> (-6.82)	-4.618 <sup>***</sup> (-8.37)
N	448	448	448	448
pseudoR <sup>2</sup>	0.045	0.072	0.077	0.142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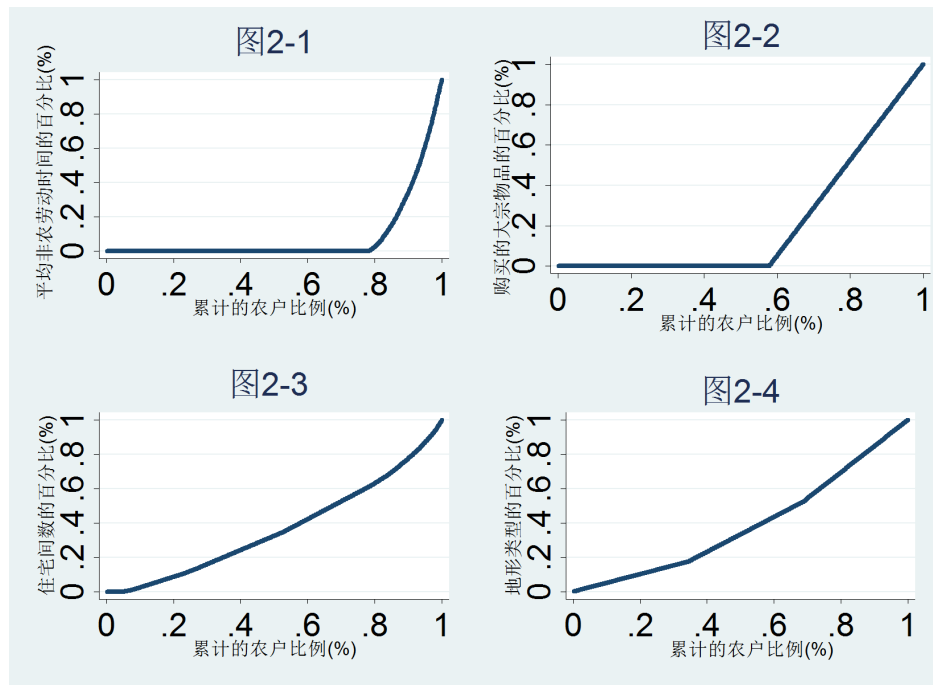


图2 主要变量的洛伦兹曲线

## 2. 洛伦兹曲线分析

针对二元 Logit 模型的回归结果，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完善生态就业项目的办法。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所有样本农户在贫困程度、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三方面的差异，本文分别作了外出务工

月数、购买大宗物品、住宅间数和地形的洛伦兹曲线（见图 2）。他们对应的洛伦兹系数依次是 0.84、0.58、0.27 和 0.22<sup>④</sup>。从洛伦兹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出，有近六成的农户年内没有购买过大宗物品，有近八成的农户外出务工月数是 0。相对于购买大宗物品和外出务工月数来说，地形和住宅间数的分布相对均匀。由于外出务工月数和是否购买大宗物品的分布差异性是最大的，所以生态就业项目的实施者应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用于收集农户的机会成本和贫困程度方面的信息，以提高生态就业项目资金的成本效益。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目前生态就业项目实施过程中，主要考虑生态服务价值因素，而没有或较少考虑贫困程度因素，并且目前生态就业项目的成本费用高于其最优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态就业项目发挥“一石二鸟”的作用。考虑贫困因素，不仅有利于减贫目标的实现，而且能够间接地缓解生态就业项目的成本压力。但是考虑贫困因素需要良好的基础数据收集。农户在机会成本和贫困程度方面具有较大的异质性，更多地掌握这两方面的信息有利于提高生态就业项目资金的成本效益。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对生态就业人员的指导、培训和考核力度。目前的生态就业还是比较初级的就业形式，就业人员缺少相应技能。

---

<sup>④</sup>由于地形因素数据的局限，可能造成低估地形因素分布的异质性，其真实值可能大于 0.22。



减贫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生态目标的实现为前提，政府要对生态就业人员加强指导和培训，挖掘农民从事生态就业的潜力，提高其提供生态服务的价值。加强生态就业人员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减少和杜绝政府“花钱养懒人”的现象。对于目前已经参与到生态就业项目中的农户，应着力提高其提供生态服务的水平。

第二，加强基础信息收集工作，项目的实施者要充分了解当地农户的基本情况。在实施生态就业项目的过程中，筛选能提供较多生态服务的贫困户是以良好的基层信息收集工作为前提的。基层干部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生态就业项目不仅需要加强对生态就业人员的指导和培训，更需要加强对相关村镇干部的培训 and 监督。由于生态就业项目往往以行政区划为边界，村镇干部的个人意志对于如何安排生态就业人员具有一定的影响，而村镇干部的工作能力、工作水平往往良莠不齐，这加剧了生态就业项目转移支付的波动性。

第三，虽然考虑贫困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就业项目的资金压力，但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生态就业项目的生态目标和减贫目标，应在政府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加大补偿力度。如果生态就业转移支付不能够弥补参与者参与其他劳动的机会成本，生态就业就不能够起到减贫作用。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杜洪燕 武 晋



## 清华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301 室（邮编 100084）

电话：86-10-6277 3526

传真：86-10-6279 6949

电子邮箱：cirs@mail.tsinghua.edu.cn

网址：<http://www.cirs.tsinghua.edu.cn>

刊号：TH-T-1021

（使用本文需征得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同意）